

日译西书中汉字在西学东渐中的作用

□ 李 炜

“西学东渐”，通常指代16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科技及人文思想在东亚传播的历史进程。汉字作为东亚文化圈的通用载体，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除中国自身外，日本也是通过汉字实现了对西方概念的吸收与内化。

日译西书中的汉字。17世纪之前，对日本而言的外国主要指中国、朝鲜、印度等亚洲国家。随着欧洲地理大发现的推进，英国、葡萄牙、西班牙等纷纷试图打开日本的贸易通道，日本也由此被动地“发现”了欧洲。当时的德川幕府经过多方面的利害衡量，特别是在荷兰人承诺永不进行基督教布教的前提下，最终只允许欧洲的荷兰商船进出长崎，精通荷兰语的日本通词（译员）随之诞生。不过，在幕府连续五次（1633—1639）颁布锁国令的背景下，西方书籍均被禁止翻译。直至1720年，时任将军德川吉宗缓和了禁书令，借助荷兰语翻译介绍欧洲近代知识的“兰学”才得以诞生，1744年问世的《解体新书》被誉为首部成熟的兰学著作。

兰学的出现，打破了日本既有的“汉学/和学”二元学术格局，并从此拉开了汉文、日文与西文相互碰撞与融合的历史序幕。不容忽视的是，最初的兰学家是德川幕府官方指派且规定世代世袭的知识阶层，他们原本具有深厚的汉学修养，再加上“汉文”是当时最主要的学术语言，故而在面对原有知识体系中并不存在的西方概念及术语时，兰学家们往往通过“意译”“直译”“音译”等方式将之转换为汉字词，如《解体新书》中出现的“软骨”“神经”“机里尔”等。

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的到来打破了日本持续二百余年的锁国制度，向海外吸收新知的路径也从荷兰语转向英语。特别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推行学习西方的“文明开化”政策，于1871年派出了包括政府高官及留学生在内的超百人“岩仓使团”，历时近两年，先后考察了美洲及欧洲的十二个国家。此外，日本政府还积极选派留学生到美、英、德、法等国留学。在此背景下，政治、军事、科技、经济、文学等各领域

的西方书籍被大量译介到日本。而从事相关活动的明治知识人，依然会采取与幕末兰学家相似的翻译策略，即用汉字词汇来对接西方概念。

“西文→汉文”翻译策略的历史根源。日本知识人为何会用汉字翻译西方概念？其内在原因错综复杂，但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因素不容忽视。

其一是汉字在日本书写体系中的地位。众所周知，在汉字传入之前日本并无记载文字，后经过对汉字的引入、吸收与转换，日本出现了同时借用汉字形式与意义的“真名”、只利用汉字表音的“万叶假名”、仿照汉字造字法新创的“国字”、依据楷体汉字蜕变的“片假名”、根据草体汉字简化的“平假名”等多类文字，由此也诞生了“汉文体”“和文体”“和汉混合体”等不同书写文体。至少在明治中期之前，日本知识人主要使用的都是“汉文体”，其具体形式又可笼统分为两大类：一是直接用古汉语书写，但为方便日本读者阅读，会在汉字旁添加表示语序或修饰关系的返点及训点，在此姑且称之为“汉文训点体”；二是“汉文训读体”，即按照实际阅读顺序书写，同时将起训点作用的片假名从旁注位置移到句中。以“骨鯁在喉”为例，前者形式为“骨鯁在、喉”，后者形式为“骨鯁喉ニ在リテ”。因此，即便单从文体匹配的层面考虑，用汉字词汇对译西方概念也是日本知识人的最佳选择。

其二是汉字本身具有不断派生新意的造词能力。恰如章太炎所言，“汉文既有孳乳渐多之用，术语虽阙，得并集数字以成名，无所为病。”日本知识人亦充分利用汉字的优势，或从中国古典文献中借用旧词赋予新意，如“经济”“影响”；或发挥汉字的表意特性组合新词，如将“哲”与“学”组合成“哲学”；或利用汉字的偏旁部首重新创造新的汉字，如“癌”“研”；或直接用汉字音译，如“俱乐部”“浪漫”。简言之，用汉字词汇对译西方概念，不仅能有效解决原有词汇不足的问题，还有助于日本人对新译词意义的理解。

其三是中国的汉文西书及早期中英词典的影响作用。这里所说的汉文

西书可大致分为四类：一是明末清初中外人士合作著译的书籍，如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二是早期“开眼看世界”的中国学人之著作，如魏源的《海国图志》；三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同文馆等官方机构推出的译书，如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四是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的刊物，如上海墨海书馆推出的《六合丛谈》。所谓的早期英汉词典，主要有马礼逊的《英华字典》、卫三畏的《英华韵府历阶》、麦都思的《英华字典》、罗存德的《英华字典》等。上述所列书籍、杂志及词典均很快传入日本，其中包含的译制汉字新语也被同时代日本知识人广泛采借，成为他们翻译西学论著时的重要参照。

综上所述，日本知识人在翻译西方概念时使用汉字，可以说是上千年以来中国文字及文化持续影响日本的历史必然，而这反过来又为中日文化交流走向出现逆转提供了前提条件。

“汉字环流圈”的形成及其历史启示。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利，促使国人重新思考如何借鉴西方科技增强国力的问题。作为一种应急策略，部分晚清官员及知识人士开始主张以日本为中介翻译西方书籍。如张之洞在1898年的《劝学篇》中鼓励中国人赴日游学，强调“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且“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梁启超更是明确指出，“日本与我同为文之国，自昔行用汉文。自和文肇兴，而平假名片假名等，始与汉文相杂厕。然汉文犹居十六七。日本自维新以后，锐意西学，所翻彼中之书，要者略备。其本国新著之书亦多可观。今诚能习日文以译日书，用力甚鲜而获利甚巨。”不难看出，日本对西书的广泛译介，特别是日译西书中存在的大量汉文，成为了促使张之洞等人提出相关主张的重要原因。总之，在多方力量的推动下，晚清至五四运动期间，中国迎来了翻译日文书籍的首个高潮，大量汉字词汇也随之被带回中国，如我们现在熟悉的“美学”“理论”“干部”“动员”等，都是从日本逆向输入的词汇。

汉字，在经过“中→日”“西→

中→日”“西→日→中”“中↔日”的复杂流动后，最终在中日两国间形成了独特的“汉字环流圈”。在这一流动过程中，不仅有大量新词汇诞生，东西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也得到了增强。在此借用沈国威教授在相关论述中的说法，汉字不只为东亚各国提供了古典文本和语言的记录手段，形成了被称为汉字文化圈的文化共同体，汉字文化圈也正是依靠古老的汉字才完成了西方近代新知识体系的受容。

重申西学东渐之历史进程中的“汉字之功”，对当代中国仍具有较大的启示意义。首先，在翻译方法论及术语建设方面，我们或可借鉴近代中日学人对汉字的多元运用方式，在尊重“源语”逻辑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汉字的表意优势及创新潜能，避免对西文“直译音译”的过分依赖，以文化自觉的态度处理不断涌现的新概念、新术语，进而建立兼具开放性与主体性的语言创新体系。近年出现的“人工智能”“碳中和”“元宇宙”“区块链”等词语，均可谓典型的成功译例。其次，在推动区域知识共同体建构方面，或可充分利用作为东亚共同文化遗产的汉字优势，打破学术交流壁垒，建立协同翻译机制，由此推进中外文明互鉴的深度与广度，同时增强全球知识生产中的东亚话语。

在21世纪的今天，国人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与晚清的“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不可同日而语，但中国与不同文明、不同国家间进行交流互鉴的姿态从未改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因此，如何让具有悠久历史底蕴的汉字持续赋能未来，如何提高汉字在现代知识体系中的适应性及普及性，就成为今日国人需持续思考的重要问题。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日文系教授）

我们要始终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积极服务和融入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积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加快先进制造业“引进来”。建强用好各类开放合作平台，推动汽车、机械等优势产品“走出去”，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制造业发展空间。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发展靠产业，产业靠项目，项目靠招商，招商靠环境。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强调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我们要着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深入开展壮大实体经济调研服务，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坚持全链条谋划、全周期跟踪、全要素保障、全过程服务，创新招商引资模式，深入开展产业链招商、驻外招商、以商招商、资本招商、场景招商，构建起涵盖从项目谋划、洽谈、签约，到项目开工、建设、投产、达产的全闭环工作机制，全力“招大引强、培新育优”，不断增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后劲。

大力弘扬工业文化。继承保护、弘扬传承优秀工业文化，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强大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文化自信融入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中，养成昂扬向上的风貌和理性平和的心态。新征程上，我们要充分挖掘好、利用好柳州百年工业积淀的文化资源，推动大国工匠、国家卓越工程师竞相涌现，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浓厚氛围，广泛凝聚起强工业、兴产业、促发展的思想共识，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群众坚守工业本色、挺起工业脊梁、重振工业雄风、再创工业辉煌。

（作者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柳州市委书记）

“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出自唐代王维《献始兴公》，是诗人对贤相张九龄的赞美。此诗意为，权力不是可以用来交易的私有物品，行使权力的一举一动都应为人民的福祉谋划。诗句深刻揭示了治国理政的核心在于公权不可私用，其存在和施行的目的是为苍生百姓谋福利。

为政者能否严守公私界限，绝非个人品行小事，而是关乎政权稳固的根基。公私界限清晰，则民心汇聚、政通人和；若公私混淆、公器私用，便会侵蚀执政根基，动摇民众信任，终致人心离散、乱象丛生。

其一，公私分明是树立威信、赢得民心的根本。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公”曰：“公，平分也。从八，从厶。八犹背也”。“八”是“背离”，“厶”是“私”。指出“无私即公”的内核。《明史》记载，于谦任豫、晋巡抚时，“每议事京师，空囊以入”，不仅不带礼物，还以“清风两袖朝天去”的诗句明志，正是于谦的坚守让民心顺服。先秦典籍《六韬》曰：“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若公器为私所用成为常态，必然侵蚀百姓对权力的信任，导致民心背离，最终动摇国本。

其二，公私分明是破除朋党、防范内患的保障。《尚书·洪范》垂戒：“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春秋时期，名相管仲临终前，齐桓公询问继任人选，管仲否定了与自己私交深厚的鲍叔牙，认为其性格严苛难以容人，转而举荐隰朋。管仲任人唯贤，不徇私情，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被尊为“春秋第一相”。相反，据《后汉书》记载，东汉后期，梁太后之兄梁冀“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几乎垄断中枢要职。外戚专权使王朝统治爆发深层危机，终致黄巾起义，诸侯纷争，社会“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四百年汉祚遂以分裂告终。公论不彰、私欲膨胀，终会导致祸起萧墙，威胁政权根基。

其三，公私分明是政令畅达、治理高效的关键。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是依靠“公器公用”原则缔造盛世的典型范例。《汉书》记载，汉文帝刘恒欲建露台，召集匠人计费，听闻需花费“百金”，便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汉文帝、景帝清正克己、休养生息，终使国库充盈、百姓安居，开创了“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的社会繁荣局面。严持公私界限，使公器尽归本位，资源悉为民谋，方能使上下同心同向，号令畅行如砥，激发出惊人的治理效率，臻于“政通人和”之境。

《商君书》曾言：“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蛀虫多了，木头会折断，裂缝大了，墙壁会倒塌，而公器私用这类为政之“蠹”若泛滥，便会像蛀虫与裂缝般侵蚀国家根基。纵观历史，公器私用的行径往往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曰权钱交易，化公器为私库。南朝刘宋时期，邓琬父子“并卖官鬻爵，使婢仆出市道贩卖，酣歌博奕，日夜不休”，造成“群小横恣，竞为威福，士庶忿怨，内外离心”的不正之风。《管子》有云：“货上流，则官徒毁。”将国家赋予的权力作为计价筹码，是公权最严重的异化表现。公权牟利一分，则人心溃散一寸，终如决堤之水，尽毁社稷基业。二曰优亲厚友，使公门若家宅。古之民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恰是这种家族化公权的生动注脚。唐玄宗天宝年间，杨国忠凭椒房之宠执掌权柄。《旧唐书》载其“自侍御史以至宰相，凡领四十余使”。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曾讽刺当时乱象，“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裙带泛滥之日，大厦将倾之势。三曰挥霍无度，视公器如泥沙。历史上，有志之士常对此种享乐奢靡之风作出辛辣批判。杜甫曾描绘过安史之乱前夕唐王朝官宦阶层的腐败景象，“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李商隐更是犀利道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憷国家之慨，耗民脂民膏，穷奢极欲，最为不仁。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乏肃清公器私用之弊的宝贵政治经验。治吏必先立法，如商鞅变法提出“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犯法则刑，“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韩非疾呼，“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唐高宗年间修订《永徽律疏》，其中“六赃”罪名直指六种非法获得公私财物的犯罪，明辨公私，严惩不贷。宋代杨万里说：“法存则国安，法亡则国危。”约束公权的核心智慧，正是不断完善立法与强化执法，以法的刚性力量筑牢

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

公权运行的边界，让公器始终服务于公共利益。

监督实则权畏，监督虚则权狂。《战国策》记有齐威王悬赏纳谏一事，“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使齐国不战而胜，所谓“战胜于朝廷”。北宋包拯担任谏官期间，公然弹劾“国丈”张尧佐，请宋仁宗“断以大义”，成为历史佳话。古之明君如李世民，深知“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智慧；古之诤臣如魏征，颇具“犯颜直谏”的风骨。于是有“贞观之治”，公器固而民心安。约束公权的另一重要智慧，在于强化监督，构筑防范公权滥用的防线。

在源远流长的德治文化中，始终将“廉”字奉为公权伦理之圭臬。名臣杨震赴任东莱太守，故人王密夜间到访，赠金十斤，并言“暮夜无知者”。杨震正色拒绝：“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者”！《礼记》云：“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先贤“慎独”之品格，垂范天地。约束公权的深层智慧，在于以“为政以德”涵养道德自觉，让“廉”与“慎独”的品格融入公权运行，方能永葆“天下为公”的本色，让公权始终造福于民。

公器究竟应当如何“动为苍生谋”？首先，用公器健全民生制度，保障百姓需求。古代善治之人，能将公权力作为普惠性民生建设的依据。苏轼调任杭州期间，杭州大旱，随即爆发严重瘟疫，苏轼以私人俸禄加上社会捐资，很快建立起中国最早的公立医院“安乐坊”，使瘟疫得以有效控制。明太祖朱元璋推广养济院，收容无人赡养的老人；设置惠民药局，避免贫民无法就医。公权为百姓着想，才能巩固民生根基。其次，用公器启动应急机制，守护百姓安全。古人在构建公共应急机制上展现出卓越的智慧。北宋时期，黄河决口，百姓流离。时任青州知州的富弼有序调度，开仓放粮，赈助富户帮助灾民，开放山泽森林，鼓励种植自救，终于救活流民无数。公权聚拢“急难愁盼”，才能真正办好实事。最后，用公器畅通民意渠道，解决百姓困难。畅通言路，方可确保下情上传。武则天执政时期，于官门设四色铜匭，其中白匭置于西面，专接民间申冤陈屈的状纸。宋太宗年间，设置登闻鼓院，目的是“万邦之事无隔于九重”。

“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强调的是公权不可私售，行事当为百姓谋划，是对公权本质与为政宗旨的精准诠释，彰显了中国士大夫以民为本、坚守公义的价值追求。当每一分权力都保持对“尔俸尔禄，民膏民脂”的敬畏，才能真正实现“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当每一项决策都遵循“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准则，才能真正做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当法度、道德与监督共同作用，在实践中共铸公器不私、公权不堕的政治形态，权力才能够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造福于民。

（上接1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全国各地就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开展调研指导，在考察柳州时强调，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展壮大实体经济，都离不开制造业，要在推动产业优化升级上继续下功夫。作为西南地区百年工业重镇，柳州必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始终把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坚决端牢饭碗饭碗、保持发展定力，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传统产业是我国制造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是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工作。传统产业作为老工业基地的宝贵家底，不仅不能当成“低端产业”简单退出，而且必须改造升级，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的生机活力。新征程上，我们要持续在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上下功夫，广泛运用大数据技术、绿色技术，加速推进重大产业标志性工程，加快机械、汽车、钢铁等重点产业机器换人、设备换芯、生产换线，促进汽车产业向新能源和智能网联转型、钢铁产品结构调整、工程机械电动化与智能化发展，巩固推进林木加工、化工、食品等传统产业优势，让“老树发新枝”。生产性服务业依附于制造业而存在，不仅仅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也是二三产业加速融合的关键环节，更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态、环境和土壤。要以强生产性服务业带动强制造，大力发展现代物流、现代金融、工业设计、科技研发、检验检测、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快推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实现制造业向价值链中高端延伸。

推进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新兴产

业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支撑，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力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做强做优数字经济、新能源等产业。作为老工业基地要把发展新兴产业摆在重要位置来抓，全力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使之成为破局求变、突围求进的强劲动力。新征程上，我们要聚焦智能终端及机器人、新能源、新材料、医药大健康等新兴产业，持续建链、延链、补链、强链，培育更多产业链细分领域专精特新企业和单项冠军企业，打造更具竞争力的新兴产业集群，全面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以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新型工业化的鲜明特征。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积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智能产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新征程上，我们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大力推进全域全时人工智能场景应用，打造“人工智能+”示范项目，构建覆盖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城市运行、重点行业赋能的全场景建设体系，为千行百业注入新活力。重点推进“人工智能+制造”行动，既培育壮大人工智能产业，又围绕地方主导产业深化垂直领域大模型场景应用，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新技术加快提升产业竞争力，着力打造广西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及产业集群创新基地，其中应用场景展示中心和产业集群示范基地是建设的重中之重。

以绿色低碳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绿色低碳是新型工业化的生态底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培育大量生态产品走向市场，让生态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把生态文明理念贯穿新型工业化全过程、各方面，积极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国家低

碳试点城市、“无废城市”，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做强绿色制造业，发展绿色服务业，壮大绿色能源产业，加快构建以绿色工厂、绿色产品、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为主体的绿色制造体系，不断提升经济发展“含绿量”，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全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大力营造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良好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新型工业化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做好各方面政策和要素保障，开拓创新、担当作为，汇聚起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强大力量。我们要更加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对新型工业化的新要求，坚持系统观念，强化要素保障，凝聚起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制造强市的强大合力。

全面提升创新能力。创新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根本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要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我们要准确把握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之间的关系，高水平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建设重大科研平台，推动产学研协同发展，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打造高效协同的创新生态体系，以科技创新引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着力深化开放合作。开放发展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中国正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